

炫舞荆楚： 新时代长江文化的青春表达

□兰文文



《炫舞荆楚》剧照

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期间，由湖北省文联、省舞协主办的“荆楚舞蹈人才培英计划‘炫舞荆楚’第一季成果展演”在武汉琴台大剧院精彩上演。这台历经五年精心培育、通过三期系统孵化而成的原创舞蹈作品展演，凝聚了荆楚中青年舞者的本土实践心血。作品深度融合楚文化浪漫基因、非遗技艺活态传承、红色精神当代诠释与现实题材人文关怀，既是长江文明历史脉络的传承延续，更是新时代长江文化的青春表达。

让文物非遗在舞台焕新

荆楚大地的文物与非遗，是长江文化基因的鲜活载体。“荆楚舞蹈培英计划”（以下简称培英计划）引领创作者深耕本土文化土壤，走进博物馆，扎根非遗现场，将文化瑰宝活化为灵动的舞台语汇。

《楚漆姿色》从千年楚漆工艺中汲取灵感，将凤鸟纹样的曲线美转化为舞者肢体的“S”形律动，黑红两色的服饰随动作开合，宛如出土漆器历经千年仍焕发光彩，既生动体现了楚人“火耕水耨”的生活智慧与“筚路蓝缕”的开拓精神，又巧妙实现了“从文物到身体语汇”的转化。楚舞“广袖善舞”“曲折体弯”的美学特质，在《橘颂》中得到精美演绎。舞者以腰为轴的翩跹舞姿，再现屈原文中橘树的忠贞品格，长袖拂地的轻柔与骤然扬起的刚劲形成强烈反差，恰似长江兼具静水深流的温婉与惊涛拍岸的磅礴，让两千多年前的楚舞美学在当代舞台重焕生机。

非遗的创新传承更具巧思。利川“肉连响”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，在《震山擂》保留其原始拍打节奏，通过男子群舞的调度变换，将山野汉子的阳刚之气凝聚成撼动群山的力量。《村花在笑》则打破性别局限，把传

统男子专属的拍打动作转化为现代女性身体语言，通过不同力度的拍、抚、弹、敲，细腻勾勒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女性的开怀之笑、忆苦之笑与憧憬之笑，实现非遗元素的时代性表达。土家族女子群舞《娃娃过河》通过祖母慢摆手与少女快摆手的角色对话，将清江水波意象与祖孙代际传承交流，让“过河”从地理空间跨越升华为精神传承的象征，彰显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度开掘。这些浸润长江文化基因的作品，如朵朵浪花既承载着历史记忆，还奔涌出未来希望。

用舞蹈讲好新时代信仰故事

长江流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摇篮，更是红色精神的孕育之地。创作者聚焦荆楚红色富矿，以舞蹈为媒介，构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。

男子独舞《向前》采用倒叙手法，舞者在舞台上逐一穿戴起军装、挎包等物件，每一件道具的增添都是信念凝聚的过程，最终以视死如归的决绝奔跑定格。通过“道具叙事”将“保家卫国”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充满力量的身体语言。《深港》以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黄旭华院士为原型，群舞构成的“浪花”意象与青年科技者的“潜水”动作交织，生动展现第一代核潜艇研制者“甘坐冷板凳”的科研精神。舞者在“波涛”中一次次下潜又崛起，他们的姿态好似长江礁石历经冲刷仍屹立不倒，深刻诠释“科技强国”的时代主题。

三人舞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聚焦平凡英雄，讲述一对中年夫妇对救火牺牲的儿子的深切思念。该作品采用倒叙与插叙交织的结构，融入火警鸣笛声等声场细节。在虚实场景的转换中，将个体的悲痛升华为对奉献精神的生命礼赞，使舞蹈更具生活温度与人

性关怀。无论是从革命年代的舍生取义到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，还是从科研领域的攻坚克难到平凡岗位的无私奉献，这些作品勾勒出荆楚舞蹈的精神图谱，让长江文化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。

探索人才培养的湖北路径

荆楚舞蹈的蓬勃发展，离不开科学系统的培养机制。作为湖北省委宣传部艺术发展资助专项，培英计划构建了“田野采风—非遗研习—创作引导—舞台展演—专家研讨”的闭环培养模式。三期计划遴选60余名学员，涵盖专业院团骨干、院校教师与文艺群体代表，形成“选才—育才—成才”的良性循环，为区域舞蹈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。

培英计划的独到之处，在于将创作起点放在田野而非排练厅，学员由“他者”到“在场”，深人体悟文化精髓与生命活力。《薅呀薅呀薅》的编导正是在农田劳动中获得灵感，构思出“草帽挂锄头”的舞美创意，让劳作场景既真实可感又富有诗意，彻底摆脱了艺术创作的程式化束缚。

平台搭建为人才成长保驾护航。培英计划整合编导、作曲、舞美等多领域资源，通过采风交流、创作引导、作品研讨等形式提供全方位指导。《界碑》的打磨过程中，创作者在“集体会诊”中深受启发，将戍边战士守护的界碑一物多用，精准凸显“宁可向前一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”的戍边精神，有效提升作品的艺术品质。

人才培养的成效最终体现在作品的影响力上。截至目前，培英孵化的作品已有3部入围中国舞蹈“荷花奖”终评，3部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，2部入选全国民间舞

创作汇演。20余部作品荣获各类专业奖项。这一成果充分印证培英计划在发掘地域文化、培养本土人才方面的显著成效，为荆楚舞蹈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，也为长江经济带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。

激活长江文化的创新动能

炫舞荆楚的创新实践，是新时代长江流域文化建设的主动探索，进一步丰富了长江文化“多元一体”的格局。在文化认同层面，作品中的楚漆纹样、土家摆手、江水意象等地域符号，不断强化区域文化认同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“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”，这种文化自觉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。

在艺术创新层面，荆楚舞蹈走出了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的路径。无论是楚文化基因的解码，红色信仰的时代讲述，还是现实题材的人文关怀，都证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，能获得充沛的时代生命力，为其他地域文化的当代表达提供有益借鉴。

从发展生态来看，培英计划构建的创作、理论、教育联动机制，揭示出区域舞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。尽管目前荆楚舞蹈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创作实践，但学科建设与平台搭建正在稳步推进，未来有望形成“创作带动研究，研究反哺创作”的良性循环。

“炫舞荆楚”的成功实践证明，唯有深深扎根区域文化沃土，才能创作出有生命力、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。秉持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精神，荆楚舞者正以青春之力在艺术长河中不断探索，为长江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

（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、湖北省文联副主席）

“工人情结”与我的写作

□武敬

我十八岁走进工厂，按照当下青年的人生节奏，这个年龄应该在大学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，应该在校园绿荫下谈情说爱，应该在校园晚会上朗诵诗词歌赋，可是我却远离浪漫的校园生活。身材消瘦单薄的我，穿着“劳动布”工作服，脚踩厚重笨拙的“大头鞋”，站在操作平台上，高高地举起十八磅大锤，在各种机器的噪音声中，终日挥汗如雨。那时候经常加班，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加班，是在1981年的中秋节，那时候我进厂已经一年有余，因为脚踏车坏了，坐公交车回家，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，我望着天上的月亮，脚踩地上的月光，因为过度疲惫，双腿异常沉重，我坐在空无一人的马路牙子上休息，望着不远的庄稼地和更远处的荒地……郁闷、忧伤、失望……各种情绪相互叠加……那时候，想过许多光怪陆离的逃离办法，后来还想过用“工伤”离开工厂。最后坚持下来，在成为一个优秀工人的同时，用体的方式走向更适合自己的领域。离开工厂的那一年，我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，更是个个不怕任何困难的文学青年。

在离开工厂后的很长时间内，我不愿回首往事，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，自然而然地遗忘“工厂故事”许多年。但是岁月有岁的定律，岁月也有岁月的深情；当岁月送你白发、赠你皱纹的时候，往事又会顺着时间隧道逆行，重新唤醒久远的生命记忆；过去工厂生活时的细节和场景，不知道是在哪一天，忽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；这才恍然发现往事从来没有远去，只是隔着一层薄薄的宣纸，只要深情地呼口气，那张宣纸立刻化作一捧白净的清水；所有的阻隔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犹如今天与昨天。

四十多年后再去回想过去的工厂生活，还有曾经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，常常令我激动不已。班组里的老工人大多小学文化，年轻工人初中水平，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是学问不低。有个师傅多次私下里纠正我说的错别字，让我由此变得小心谨慎，从此以后，搞不清楚的读音，再不会冒失地念出来，而是先去查查字典，然后记在本子上，做好拼音注释。还有工人平日沉默不语，经常冷不丁冒出一两句“不修边幅”的民间箴言，看似粗糙但是仔细琢磨，却是内含深刻哲理。

干完活休息的时候，我喜欢去厂区后面的废品堆，那里堆积着大量的工业废料，在阳光下仿佛一座能够发光的山；除了围墙，还有一条铁轨从两扇灰色大铁门下笔直穿过；脑袋枕着铁轨，身子躺在路基旁的青白色的碎石头上，稍微侧身，目光就能从灰色大铁门

下面探向厂外。厂外没有人影，有树木和野草，还有偶尔跑过的野兔和黄鹌以及忽飞忽停的鸟儿。树木是粗壮高大的杨树，灰色大铁门下只有大约半米的空隙，无论怎样把眼睛贴近地面，也不会看到树木的全部；漫无边际的野草特别茂盛，三四岁小孩子跑进去，能够被野草完全淹没。铁轨伸向无穷的远方，目光在带有锈迹的铁轨上可以自由地跳跃，还可以没有约束地漫想：有个师傅也有这个爱好，我们经常结伴而去，迎着冬日的温暖阳光，躺在铁轨旁，听师傅给我讲他读《忏悔录》的内心感受；后来这个师傅退休后开起出租车，车里总会放上一本书，等活儿的时候，不抽烟不聊天，只是看书，他不爱讲话，多年之后忆起他的模样，总会想到沉默的雕塑。组里的师傅们鼓励我读书，鼓励我写作，他们用自我贬低的语言，真诚地鼓励我要有更大作为，他们说我将来一定能当上记者；那时候，师傅们把所有文化人统称为记者。我经常坐在干活的平台上，望着头顶上驶过的火车，在轰隆隆的声响中，默默地背诵《致云雀》，那一刻觉得所有的劳累全都飞走了。

回想往事，我感激十八岁时的工厂生活，这是我难得的人生履历；工人师傅让我及早地丰富了社会经验，这对于我未来写作非常重要，所以我把六年的车间生活比作我的社会学。非常遗憾的是，我没有带过徒弟，没有感受过当师傅是什么感觉，因此也对“师傅”这个称谓充满特别敬意。

柏拉图曾把国王比作牧人。那么，我应该把工人师傅比作什么？

我籍贯山东，出生在天津。工作之前我陪父亲回老家，老家亲戚也常来天津；来往频繁阶段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，这段时间也正是我在工厂的日子。与老家亲戚面对面机会多了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我姑姑称呼我父亲“亲舅”，姑姑女儿称呼我父亲“亲舅”；假如他们跟别人说起我父亲，还会加上一个“俺”字，也就是“俺亲舅”和“俺亲舅”；老家的亲戚把“亲”字叫得特别响，听得出来，他们在“亲”字上特意加重了语气。那时候我不太懂“亲”字含义，觉得这样称呼有些多余，哥是哥，舅是舅，加个“亲”字不是多余吗？

二

我在柳焊车间的工种是铆工，先后走过两个铆工组。每个铆工组有十二三人。按照沿袭下来的规矩，除了带我的师傅是“我师傅”，其他人也都是“我师傅”。我们车间有四百多人，比我早进厂的工人，我都是以“师傅”来尊称对方。以此计算，我应该有二十多位接触较多的师傅，以及没有私下联系的四百多名“准师傅”，虽然时间过去那么久，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姓名，但是我能够记住大多数人的身高、长相、表情以及说话的腔调。

在工厂期间，我有过初始的沮丧、低沉、迷茫，也有过后期能够制作简单生活用具的快乐；因为安心下来，不再躁动，发现车间里有许多令人着迷的地方：厂房有着居民楼六层楼的高度，车间上空飞舞着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和灰色的野鸽子；傍晚的夕阳照射进来，把车间镀上一层金黄色光晕；鸟儿的飞翔与鸣叫，让下班后静寂无人的车间，拥有了郊野公园一样的美妙；油压机、剪板机、电砂轮……随意看过去，一定会有一个角度闪烁着迷人的光泽；绝大多数的师傅有着一双灵巧的手，

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会难倒他们。工人们有一句挂在嘴边上的家常话：过日子用的东西，还回去商店买？师傅们除了铆工的看法本——钣金工艺——之外，精湛的手艺还会延伸到木工、电工、泥瓦匠。另一方面，师傅还会裁剪和缝纫，还会用竹杆子打毛衣、用铁杆子织线衣，用细小的钩针上下飞舞地钩带有“狗牙边”的假领子；下班后还会尽情玩乐，滑冰、足篮排、吊环、哑铃、单杠、双杠、游泳、养鸽子、玩蝈蝈、养花……无论玩什么、养什么，都能做得有模有样。

四

我的师傅中除去几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，其余都是“七〇届”初中毕业生，他们大我八岁，我进厂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进厂十年；如今回想起来，“七〇届”的他们虽然当了师傅，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；但是他们在我心中，已经是颇有工作经验的老工人了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写过“三工”题材的中短篇小说，后来写“革命历史题材”；近年来再回工业题材写作，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也有散文、随笔和报告文学以及儿童文学；我要用更多文学体裁来表现工人的精神气质，借以抒发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“工人情结”，但不想重复二十多年前的叙事路径，所以我给自己的写作重新命名——“社会工业题材”，让笔下的工人形象呈现不同的社会身份，以及由不同社会身份所带来的性格迥异的工人面貌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必须让叙事边界尽可能地扩展，让叙事更加具有社会广度和思想深度。随着岁月流逝，我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；尽管现在用“师傅”来做尊称的人越来越少，但是“师傅”的历史含义，始终没有失去书写意义，因为它蕴含丰富的历史元素以及新的美学意义。

哲学家、美学家瓦迪斯瓦夫·塔塔凯维奇说过：“原初艺术的概念泛指一切技术性的产品”，也就是说，所有劳动者用智慧、用汗水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属于艺术品范畴；由此可以推定，劳动者就是艺术家。

如今再去想象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在劳动者聚集的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的场景，还有若泽·萨拉马戈把文学创作比喻成木匠手艺的话语，也就越发清晰写作者的创作真谛：身体永远匍匐在地，思想高空展翅。只有这样的创作姿态，才能听到乔治·桑塔耶纳来自心底深处的感悟：“我所研究的是真情，而不是新奇。我的努力，完全是为了把那些基本审美感情纳入正轨，从而使判断得以恰当，鉴赏得以高卓。”（作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）

作者没有局限于抗洪救灾的宏大叙事，而是深刻阐释了科学精神如何成为战胜洪灾的根本保障。文中，当“烂泥湖堤顶突然炸开一条300米长、宽2厘米的裂缝”时，经过多方研判，最后决定“请省神龙地质勘测院携来地质雷达探测仪，对大堤做一个CT似的全面检查”，抢险队伍全线出击，经过“从傍晚到深夜12点，浪坎终被制服，烂泥湖堤顶平息、浪平水静”。另一方面，作者则聚焦于灾后重建中的人性温度与制度关怀。文中描写在抗洪过程中，政府工作人员如何科学规划临时安置点、调配物资，医疗队如何防疫治病，心理工作者如何抚慰伤员。村民们在废墟上互相帮助、自救恢复，这种对灾后科学重建与人文关怀并重的关照，揭示了抗洪精神的完整路径。从舍生忘死的应急抢险，到充满智慧与温度的恢复重建，体现的是对生命周期的尊重和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“以人为本”核心价值的生动实践。抗洪精神绝非单向度的牺牲颂歌，它更一曲恢宏的伦理和神曲。抗洪文学的精妙之处，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在巨大灾难面前，个人与集体、小家与大家、责任与亲情之间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。

从更深的价值阐释层面讲，抗洪文学是民族精神在危难的时刻最为集中、最为纯粹的爆发和最为真切的艺术结晶。其所弘扬的“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，不怕困难、顽强拼搏，坚韧不拔、敢于胜利”的精神，对中华民族来说，早已超越了灾情切身痛苦的教训，升华为我们面对一切的风险挑战时的宝贵的品格。如今，全球经济的逆流与各类风险的叠加，“黑天鹅”“灰犀牛”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，使得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抗洪精神的巨大作用，它就像强大的“黏合剂”，把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都凝聚了起来，共同对抗着眼下艰难时势的考验。

从审美引导层面讲，抗洪文学以其独特的崇高美、力量美和人性美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图谱。它所塑造的平凡英雄群像，如解放军指战员、农民、工程师、基层干部等等，以其朴素的伟大、惊世的平凡，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亮色且光辉的一页。它也启示广大创作者，真正的深刻不必囿于杯水风波，在时代的大潮中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直抵人心的艺术力量。

如同民族的血脉中远古的基因一样，抗洪精神深深铸入我们的民族记忆中，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。以《第二战场：武汉郊区‘98抗洪记》为代表的抗洪文学，作为这一精神最好的载体，以对牺牲奉献的崇高礼赞、对集体伦理的深刻洞察、对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关照，构建起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，对我们的个人观、价值观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不仅仅是对那一段感天动地历史的回顾，更是面向未来不竭的力量蓄积。

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，“抗洪”会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再现——发展的瓶颈、外部的压力、自然的考验。抗洪文学所弘扬的精神，正是我们破浪前行最坚固的“精神堤坝”和最强劲的“心灵引擎”。它告诉我们：只要精神的堤坝不倒，中华民族就永远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铸就新的辉煌！

（作者系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、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）

抗洪文学奏响民族精神的激昂乐章

□邓翥

读田天报告文学《第二战场：武汉郊区‘98抗洪记》

作为中国最长河流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交汇之处的武汉，在享受这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的同时，也不得不面对常年存在水患的压力。当洪水来袭全众志成城抗击洪涝时，作为时代记录者的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，创作出众多精品力作，形成了熔勇气、责任、毅力与集体意识于一炉的抗洪文学系列。作家田天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第二战场：武汉郊区‘98抗洪记》正是这一系列中悲壮、璀璨的篇章。它不仅是武汉郊区灾害现场的记录，更是抗洪精神的提炼与升华，在价值阐释与审美创造中，持续为时代注入磅礴的精神动力。

作家以白描的笔触，再现了1998年抗洪中“人在堤在”的铮铮誓言。在文中，当武湖农场大堤出现管涌时，作为农场修路队的一名副队长，“占良金和敢死队员如猛虎下山，眨眼之间已赶到现场”。而在他们的身后，农场防汛指挥部“组织了4000人的突击队，100人的敢死队，哪里有险就往哪里冲！”在浑浊的江水中，那是用血肉之躯铸成堤坝的一块块基石，那就是向江水宣战，人在堤在！文中写道：“护堤，我的身体此刻就是大堤！”作家用近乎残酷的细节，描绘人体在激流冲击下的痛苦与坚持，将生理的极限痛苦提升为精神层级的丰碑。这种“以身为桩”的意象，在《第二战场》中反复出现，也在抗洪文学中反复出现，成为一种集体记忆的符号。文中，新洲区纪委书记在洪水漫堤的危急关头，毅然56个小时不下堤，知道情况的群众都感慨道：“书记防汛防成了仙！”其悲壮程度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行为描写，直达牺牲精神的实质内核：个体生命在融入集体意志的瞬间，实现了价值的飞跃。这种叙事，让读者在灵魂震撼的同时，也深刻领悟：人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分量，以及守护这价值所需付出的代价。抗洪文学最为震撼人心的，是不回避灾难本身的残酷，却在危机的阴影中，用生命的光辉刺破黑暗。

作品在描写武汉郊区水情的同时，也对灾难中人性光辉进行了细致的描摹。文中写到“9岁的小姑娘杨娟，也有属于她的0.9米的堤防”，当她知道父母亲参与防汛时，自己在暑假也加入了抗洪大军中。“这个瘦小单薄的孩子，从此成了送饭的防汛队员。她每天往返40多公里，在骄阳如火的大堤上奔波50多天。”这种超越年龄、体力的自发互助，正是集体主义精神在极限状态下的本能迸发。更让人动容的是，同是受灾群众的江夏居民向受灾严重的簰洲湾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，“358名灾民被安置在红灯村”，“21户村民做饭送来，一下子送到村小的热饭菜可供2000人吃，灾民简直没见过天下有这么盛情待客的人”。等到20多天后勤程时，“每一辆车都张贴着这样一条标语：‘感谢江夏区人民！’这种对集体意志形成过程的真实刻画，揭示了抗洪精神深厚的伦理根基。它源于对共同家园的挚爱，在危难中被唤醒、被凝聚，最终升华为一种自觉的、强大的道德力量。个体在融入集体的过程中，非但没有泯灭自我，反而在责任的承担与互助的温暖中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感和价值确认。

作者没有局限于抗洪救灾的宏大叙事，而是深刻阐释了科学精神如何成为战胜洪灾的根本保障。文中，当“烂泥湖堤顶突然炸开一条300米长、宽2厘米的裂缝”时，经过多方研判，最后决定“请省神龙地质勘测院携来地质雷达探测仪，对大堤做一个CT似的全面检查”，抢险队伍全线出击，经过“从傍晚到深夜12点，浪坎终被制服，烂泥湖堤顶平息、浪平水静”。另一方面，作者则聚焦于灾后重建中的人性温度与制度关怀。文中描写在抗洪过程中，政府工作人员如何科学规划临时安置点、调配物资，医疗队如何防疫治病，心理工作者如何抚慰伤员。村民们在废墟上互相帮助、自救恢复，这种对灾后科学重建与人文关怀并重的关照，揭示了抗洪精神的完整路径。从舍生忘死的应急抢险，到充满智慧与温度的恢复重建，体现的是对生命周期的尊重和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“以人为本”核心价值的生动实践。抗洪精神绝非单向度的牺牲颂歌，它更一曲恢宏的伦理和神曲。抗洪文学的精妙之处，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在巨大灾难面前，个人与集体、小家与大家、责任与亲情之间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。

从更深的价值阐释层面讲，抗洪文学是民族精神在危难的时刻最为集中、最为纯粹的爆发和最为真切的艺术结晶。其所弘扬的“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，不怕困难、顽强拼搏，坚韧不拔、敢于胜利”的精神，对中华民族来说，早已超越了灾情切身痛苦的教训，升华为我们面对一切的风险挑战时的宝贵的品格。如今，全球经济的逆流与各类风险的叠加，“黑天鹅”“灰犀牛”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，使得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抗洪精神的巨大作用，它就像强大的“黏合剂”，把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都凝聚了起来，共同对抗着眼下艰难时势的考验。

从审美引导层面讲，抗洪文学以其独特的崇高美、力量美和人性美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图谱。它所塑造的平凡英雄群像，如解放军指战员、农民、工程师、基层干部等等，以其朴素的伟大、惊世的平凡，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亮色且光辉的一页。它也启示广大创作者，真正的深刻不必囿于杯水风波，在时代的大潮中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直抵人心的艺术力量。

如同民族的血脉中远古的基因一样，抗洪精神深深铸入我们的民族记忆中，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。以《第二战场：武汉郊区‘98抗洪记》为代表的抗洪文学，作为这一精神最好的载体，以对牺牲奉献的崇高礼赞、对集体伦理的深刻洞察、对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关照，构建起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，对我们的个人观、价值观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不仅仅是对那一段感天动地历史的回顾，更是面向未来不竭的力量蓄积。

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，“抗洪”会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再现——发展的瓶颈、外部的压力、自然的考验。抗洪文学所弘扬的精神，正是我们破浪前行最坚固的“精神堤坝”和最强劲的“心灵引擎”。它告诉我们：只要精神的堤坝不倒，中华民族就永远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铸就新的辉煌！

（作者系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、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）